

書評：林呈蓉著《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台灣文明開化的進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5，平裝，224頁，ISBN：9868188903）

《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 ——日本與台灣文明開化的進程》書評

李明峻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專案教師

壹、前言

這本由淡江大學歷史系林呈蓉老師所寫的《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台灣文明開化的進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5），主要是在探討日本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對待台灣，是罕見地台日關係史的佳作。

林老師在上述脈絡下，從德富蘇峰的《大日本膨脹論》等理論談起，從近代初期日本的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殖民地台灣的「條約改正」、日治時期台灣島內移民事業的政策分析、戰前日本在台灣與北海道經營的成果比較、國家衛生原理——台灣人醫療菁英的思考源流等層面，在思想上細膩地比較日本人在北海道以及台灣的拓殖，深入淺出地提起日本最後朝後藤新平的《日本膨脹論》轉型，寫得相當引人入勝。

貳、內文評析

一、前言「從德富蘇峰的《大日本膨脹論》談起」

關於前言的德富蘇峰《大日本膨脹論》的問題。從 19 世紀中期被迫

開國以來，日本朝野一直都致力於建構一個足以與列強抗衡的國民國家（nation-state），而實現此一目標的做法是達成「文明開化」。文明開化這個詞彙是在1875年福澤諭吉所寫的《文明論之概略》中，作為civilization的譯語開始被使用。文明開化是指西洋文明在明治時代傳入至日本，矧致在制度及文化上出現巨大轉變的現象。換言之，文明開化政策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推行的三大基本國策之一，是日本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

近代化＝西歐化是在明治時代的一貫課題，從狹義上說，文明開化包括學習西方的教育制度、科學技術及生活習俗等諸方面內容，並且在西學的過程呈現出不同於別國的特點。明治新政府所推行的殖產興業及富國強兵，可以看成是脫亞入歐等一連串政策的推行，但也有人指摘文明開化只是限於都市人及知識分子攝取西方文明。最終，歐化的過程使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成為近代歷史上亞洲唯一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作者在這方面頗具匠心地進行論述。

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後展開各種亞洲論，雖然它們未必可以全部歸結為昭和初期侵略亞洲大陸的思想，即它們未必認為亞洲大陸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所必不可缺的市場提供地和資源供給地，但由於在論述亞洲的同時，就等於是在論述日本國家和日本民族的未來，故如何確定日本與亞洲的關係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地必然常被作為人們探究的主要題目。

然而，這些亞洲論基本上雖是以西歐列強侵略亞洲的歷史事實而展開，意圖在各種亞洲論的媒介下，喚起與形成日本向亞洲大陸發展的內部自發力量，但卻也形成日本「一國繁榮」的國家利己主義。如江戶後期，林子平（1738-1793）撰寫《三國通覽圖說》（1785年）、《海國兵談》（1791年）和《西域物語》（1798年），基於對抗俄羅斯推進南下政策的威脅和巨大鄰國（中國）的潛在威脅提出海防論主張，而本多利明（1744-1821）撰寫《經世密策》，主張貿易立國論，不限於中國、朝鮮，將亞洲全境均納入視野。不過，林子平根據國防的觀點，認為要對抗俄羅斯的威脅，即

有必要佔有朝鮮；而本多利明闡述通向經濟自立的道路，可以說是明治初期以海軍為中心的「南進論」的萌芽。

又如佐藤信淵（1769-1850）在《宇內混同密策》（1823年）中，認為日本是世界的中心國家，而以那種民族優越主義，主張日本應「奪取」中國東北，以解除俄羅斯南下的威脅，之後將中國東北做為增進日本經濟國力的地區，以圖向東南亞「南進」之機。在這一點上，它提供日本陸軍後來佔領滿洲計畫的動機。

再如杉田鴉山（1851-1928）在《東洋恢復論》（1880年）及《興亞策》（1883年）中指出，中國人民無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倒專制權力，因此為了能讓亞洲人民從專制權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透過日本完成西歐式的近代化，藉此避免西歐列強的侵略。在《東洋攻略》（1886年）中，杉田鴉山甚至主張在犧牲亞洲的基礎上獲得日本的近代化。

自由黨左派理論家大井憲太郎（1843-1922）亦復如此。他認為：作為對抗西歐列強侵略的手段，在亞洲大陸尋求霸權，並佔有亞洲大陸，是日本應走的道路。樽井藤吉（1850-1922）在著名的《大東合邦論》（1893年）中指出：為了日韓兩國的發展，兩國將來「合邦」是最好的道路，而國名要取名為「大東」。

在這些基礎上，德富蘇峰（1863-1957）認為，在西歐近代合理主義的基礎之上，透過形成西歐式公民社會來實現平等主義，但作為潛在的威脅對象有必要戒備中國。他發表於《國民之友》（1894年6月號）的著名文章〈日本國民的膨脹性〉中，強調日韓清三國的「聯合」是對抗西歐列強進攻的最佳措施，當然日本就任盟主是形成三國「聯合」的前提條件，成功地使大多數日本國民認同膨脹主義。

陸羯南（1857-1907）闡述：亞洲的「和平」只能在以日本為主軸的形式下成立，他將中國定位成和日本攜手合作的對象，但須透過日本文化及思想拒絕西歐文化及思想。內田良平（1874-1937）的《支那觀》，內藤湖南（1866-1934）在《支那論》（1914年）及《新支那論》（1924年）等

書中，亦不斷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

總之，透過以西歐的常識為根據，將中國看成是極為異質的國家與社會，亦將中國看成是一個大為脫離國際社會的存在概念，從而拒絕共生、共存思想的理論，將排除異質事物的意識潛在化，露骨地表現出對中國的強壓姿態。這些觀點終於發展為明治國家最早的對外戰爭，即圍繞朝鮮半島統治權與中國之間發生的甲午戰爭。此點也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地方。

二、第一章「近代初期日本的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

在第一章「近代初期日本的移殖民論與移殖民活動」中，作者分別論述「明治初期的移殖民論」和「內國殖民與海外移民」的問題。事實上，在轉型成爲一個「文明開化」國民國家的摸索過程中，日本首先面對人口壓力以及農民起義的問題，而在基本上有三個處理的途徑：(1)對內開發荒涼的北海道；(2)對外移民亟需勞力的夏威夷、中南美洲；或是(3)仿效西方國家進行殖民式擴張，包括琉球（沖繩）、中國東北（滿洲）、台灣以及朝鮮。其中，在(3)的部分，日本在海外擁有的第一個殖民地就是台灣。對新興的國民國家日本而言，殖民地經營成爲近代化進程上的一項新課題。另一方面，在日治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時代，台灣社會不僅假日本人之手而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更奠定今後台灣成爲一個近代國民國家的根基。

從移殖民活動與移殖民論之間互動關係的角度，綜觀近代初期移殖民論的演變，明治初期的移殖民論與甲午戰爭以後的移殖民論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前者是以解決經濟問題、累積資本爲目的的移殖民活動爲前提，立論移民論與殖民論並行的時代；後者則是資本累積到一定程度後，在帝國主義殖民支配與資本輸出的動機下立論，在甲午戰爭中日本的戰勝與海外日裔移民排斥運動的契機下，移殖民論的歷史乃逐步進入殖民論強化的新時代。

日本近代朝野對移殖民方針的擬定，一直處在摸索研究中，不過其本

身對於近代國民國家的形成有一定的功用。北海道的開拓與夏威夷的移民正是孕育近代移殖民論的「溫床」，而殖民地台灣的領有則成爲試行這些移殖民論絕佳的「實驗場」，也提供日裔移民一個不致引起國際紛爭的新場域。其實「永續經營」的前提就是國權擴張，而國權擴張具體作法就是富國強兵和人口繁衍，爲了達到目標，當前之務不外乎是引進西歐文明與開發移殖民地，台灣正好扮演這樣的角色。

雖然台灣島內的日本人移民事業對紓解日本本土人口壓力，或是解決失業的農民問題成效不彰，且歷次的移民事業幾乎都是以失敗告終，而日本的戰敗更注定總督府在移民事業上投資的血本無歸，但日本之於台灣在永續經營的概念上，確有深遠的意義。

本書研究實際的移民政策和移民事業中，亦提及「大日本膨脹論」的德富蘇峰以及「日本膨脹論」的後藤新平，爲很好的佐證。德富蘇峰是明治 20 年代意氣風發的言論人，影響深遠的史學家，他自詡爲取代「天保之老人」的「明治之青年」，在國家主義的思潮下，促使媒體人德富蘇峰建構出一套「大日本膨脹論」，提倡「平民的歐化主義」。他想要傳達的訊息是「國民國家理念的形成」與「國民自信心的建構」，一言以蔽之即「國民的統同、國體的保存、國權的擴張」。在這種思想背景下，國家的外部膨脹與國民的海外雄飛是爲求國家生存發展所必經的一個過程，殖民、領土擴張以及國民自尊心，三者之間的關係便密不可分。因此，德富蘇峰以及後藤新平便主張從對外開戰過程中，建立國民的自信心著手，而生產機關的強化與軍備的擴張則是維持國家生存、民族膨脹的兩大策略。

三、第二章「殖民地台灣的『條約改正』——1895 年淡水海關接收過程的『永代借地權』問題」

在第二章殖民地台灣的「條約改正」中，作者論述「1895 年淡水海關接收過程的『永代借地權』問題」，探討海關產權的歸屬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條約改正」的意義。

二十世紀的世紀之交的時期，日本成功不平等條約的改正。日本於 1894 年克服對英國的治外法權問題，1911 年改善對英國的關稅自主權。其時，日本國內已有一種說法：「日本已經是世界上的文明國，雖然不到一等國，但是可以說二等國以上的國家。」1905 年日本（認為）在日俄戰爭勝利之後，自己人同就是世界的一等國或文明國。當時，日本人已經開始從文明國化的過程、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提昇的過程，來描寫明治外維新以來的現代史的歷史。

在日本內部的歷史裡面，中國就是日本已經克服的、像江戶時代的日本般的負面存在。其次，中國的近代國家認同和外交圍繞中國的近代國家認同，世界各地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探討「中國怎樣發現在國際社會裡面的中國」的研究不多。其實，中國本身也需要一段時間才會調整國家意識（從王朝到主權國家）。

鴉片戰爭時，英國對清要求的不是不平等條約，就是跟中國的平等。當時中國對於給列強的治外法權和關稅的優待等，並不認為是喪失國權，而認為是恩惠。最惠國待遇也被認為恩澤均沾。但是，1880 年代就有主張改善條約差異的意見，已在脫離「朝貢體制」的脈絡。日本面對修訂對外條約中，不平等條文的「條約改正」，成為國民之於國家意識的源流。

十九世紀末，西方文明將憲政體制連同船堅砲利傳到東方，列強割據與一連串不平等的條約給中國至痛的一擊；日本則是在經過明治維新西化後，展現一番新氣象。歷史洪流的消長輪替在東亞文化圈裡鮮明可見。時值二十一世紀，當全球化的聲浪不可避免地伸向東方，我們更須了解歷史。讀歷史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鑑古知今。將歷史當做一面鏡子，在回溯前人的經驗、洞悉時代更替的轉捩點時，了解當今的形貌與處境，取捨過往的經驗和判斷，朝向更美好的明天前進。

近代的歷史（學）與顧國家或國民認同的關係很密切，歷史也算是國民想像共同體時的一個工具。在東亞，近代日本一方面建立日本的歷史，另一方面將併吞或侵略的地方之歷史，在日本帝國史上再定位。當時日本

認為中國的古代史是東亞的光華，但中國的近代是個要否定的對象。對近代日本的東方主義來說，日本是近代化的文明國家，但是中國是個未開傳統的非文明國家。日本對外國強調自己的文明國性時，這不只有國家認同的形成，還有改善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近代日本的國家認同形成與中國近代日本的國家目標代表於文明開化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政策就是一種西洋化，其對象的範圍很廣闊，徹底從政治外交到生活上（包括髮型和衣服等的改造）。當時，外交政策的最大目標是克服不平等條約。日本締結不平等條約的背景跟中國不一樣，不是戰敗條約。所以，明治初期的日本人認為，因為日本不是文明國，所以被勉強締結不平等的條約。

當然，因為日本沒有像歐美那樣的軍事力量，所以締結不平等的條約亦是無可奈何，但當時認識的重點就在文明國問題。日本國家目標的「文明開化」跟文明國問題的關係很密切。日本相信，將來法律上完備西洋式的制度、政治制度也改善、還是社會也近代化的話，日本也可能被認為一個文明國，才會改正不平等條約。在外交的層面，日本政府努力地表現自己是吸收萬國公法（國際法）的文明國家。1874年的台灣出兵事件即是這個例子。

重要的是，日本強調文明國性的時候，除了找偶像——歐美國家——以外，找到負面的對象就是中國。其實，19世紀後半，歐美國家向日本宣布多少次，歐美國家憂慮假如日本成功改正不平等條約，中國也主張同樣的事情，但歐美不肯接受中國的改正不平等條約。所以，日本特別強調中國的非文明性和日本的文明性，跟中國的差異。這種「discourse」形成不一定只在外交層面看到，同樣在國內的言論和教科書等教育系統也看得到。這種傾向在甲午戰爭以後更是一般化。

四、第三章「日治時期台灣島內移民事業的政策分析」

在第三章「日治時期台灣島內移民事業的政策分析」中，作者從「日

本民族海外發展的歷史背景」著手，研究「台灣島內移民事業的沿革」，從而進入「昭和恐慌、南進與移民事業」的探討。在 1895 年日清簽訂馬關條約以後，台灣成爲日本的殖民地；雖然總督府進行大規模現代化的努力，不過移民政策並不成功。在進入 20 世紀前夕，由於考慮以資本輸出來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帝國主義式的支配終於成爲政策的優先選項。終究，由於邊陲國防、以及南進基地的考量，讓台灣適時有快速現代化的契機。

在這移殖民之中總爲人所忽略卻具有高度同質性的戰前「海外殖民地」台灣，與「內國殖民地」的北海道之於日本帝國的角色扮演之比較，在本書中亦被提出來分析比較。透過統治經營的政策設計與資本主義化過程的觀察，發現位兩者皆具備「地方」、「邊陲」、以及「投資」型等高度同質性，兩地都是在「國家防衛線」的構想下，被納入帝國領域的範疇。同時，台灣經營的先天條件比北海道位居劣勢，且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還必須與長期駐在島內的列強資本勢力競爭，但台灣之於日本帝國的角色扮演，卻能從「極南鎖鑰」升級爲「圖南飛石」，短期內達到財政獨立的自賄目標，這是長久以來一直扮演「北門鎖鑰」角色的北海道望塵莫及。其實這些都要虧功於兒玉·後藤時代的「財政獨立二十年計畫」，其實北海道與台灣所推動的經營政策從明治 30 年代後都是大同小異，但其中最大的差別莫過於台灣的發展走「自賄路線」，而北海道的拓殖經營則走「保護路線」。

作者以輕鬆易解、條理清晰的文字，凸顯日本從封建的舊式帝國邁向強權之路，而其與臺灣、北海道等地歷史發展、交流、演變的大事件，她優雅典美的傳統文化，使讀者重新發現讀歷史的警語與樂趣，也提及現代化國家的富強進步。

伍、第四章「戰前日本在台灣與北海道經營的成果比較」

在第四章「戰前日本在台灣與北海道經營的成果比較」中，作者分別

論述「開港前後的台灣與北海道」、「台灣與北海道的近代化進程」和「從資本主義化的角度看台灣與北海道的經營」等部分。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從對外擴張的第一刻開始，就將台灣視為志在必得的囊中物，日本軍閥對中國海疆不加掩飾的貪婪和後來居上的鋒芒，迫使清政府中的洋務派重視台灣，他們將台灣視為拱衛大陸的第一道防線，台灣由是建省。這一舉措與發展南洋和北洋水師一樣，是在當時的邊疆危機中海防論者布下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棋子。它們都標誌著中國近代海權意識的覺醒，可惜與倭寇的後代相比，這種意識來得太晚而且微弱。晚清之經略近海是極不情願的，這種被動消極緩慢笨拙的海洋努力，一開始就採取近海防衛的戰略，從而一開始就蒙上失敗的陰影，因為海上軍事力量的生命在於進攻而不是防禦。北洋水師以當時堪稱現代化的、能夠進行遠洋攻擊的裝備，來消極地執行保家守土的職責，無疑是傳統中華文明安土重遷靜態防禦的戰略思維的延續。與中國同時開始近代化的日本卻由於其島民的本能，一開始就領悟到海權的真正意義。

甲午海戰的失敗，整整一百年阻止中國走向海洋的步伐。台灣的割讓使得台灣從中國的潛在和理論上的安全前哨，變成日本的不沈的航空母艦。台灣的被割讓和遼東半島的被贖固然是中日兩國和西方列強三方角力的結果，但也直觀地反應兩個民族對疆土的價值偏好：島國日本視同為島嶼的台灣為更優良的戰略資產，而古老的中華帝國更重視遼東半島拱衛京師和中原腹地的陸上屏障的價值。

另一方面，1868年揭幕的明治政府開始分兩線向西方學習，一方面請美英法德等國專門教授、工程師進入政府，最多時一年有超過500人待在明治政府。另一方面，則派遣各類菁英開拔到西方各國學習知識。日本建「鹿鳴館」，讓名媛貴婦也穿戴起洋人蓬蓬的蕾絲長裙，和洋人一樣跳起社交舞，甚至派黑田清輝去法國學油畫，可見日本恨不得化身為另一個西方國家。

必須一提的是，台灣的近代化經驗幾乎是在與日本同步進行的情況之

下，發展起來的。日本的近代化經驗始於 1868 年「明治維新」時期，主要的兩大訴求則在於「殖產興業」與「富國強兵」。然而，直至 1877 年以前，帝國政府一直忙於平息國內不滿勢力所醞釀出來的武力蜂起，整個近代化事業真正開始落實則是在這些武力衝突完全停止之後。其後不久的 1895 年，日本隨即獲得台灣新領地，由此可以推知日本帝國本身的近代化步伐並沒有比台灣快多少。對於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近代文明，在許多時候日本的執政當局也仍在學習摸索中。因此，有些時候台灣也成了日本在近代文明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實驗場。

從近代北海道與台灣經營的成果所做的比較可以推知，台灣社會的發展潛力就像是島上四處逢生的菅芒草一樣，只要一點水與些許的陽光，便長的生意盎然，對未來充滿著積極性與生命力。台灣一夕之間變成這樣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要將台灣從一個中國原始農鄉社會導向「文明開化」，變成統治初期主要的官方修辭。日本帶來無形的現代觀念和具體的現代事物，台灣的文化發展在此階段於是出現史上最大的轉彎。

六、第五章「國家衛生原理——台灣人醫療菁英的思考源流」

在第五章「國家衛生原理——台灣人醫療菁英的思考源流」中，從近代日本的國家衛生行政，探討 1895 年前後台灣的衛生環境，最後提及後藤新平與台灣的衛生行政，檢討日治時間台灣的醫療教育與菁英思考的型塑。

1895 年 6 月，日本根據清日戰爭後雙方簽訂的馬關條約內容，獲得包括澎湖群島在內的台灣新領地。然而，至少在 1895 年 6 月至 1898 年 3 月期間，文明未開的台灣對日本帝國而言，竟成爲一塊燙手山芋。由於缺乏近代教育機制的洗禮，多數的民眾仍是文盲，民智程度偏低；這裡的風土民情與日本迥異；在過去大清帝國的 212 年統治期間，因民風強悍而管理不易，導致社會公權力不張；再加上氣候溼熱，衛生環境不佳，風土病到處肆虐。由當時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可知，在日本帝國統治初期的五

年間，各種風土病肆虐的紀事隨處可見。

後藤新平赴台就任後，根據生物學的原理，一方面從事「土匪」的鎮壓，一方面設立台灣舊慣調查會及中央研究所等，實施土地及人口調查，如此在後藤新平施政之下，開始推行統治台灣與移植日本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基礎工程」，台灣財政的獨立以及統治基礎逐漸確立，然後以這些調查與研究做基礎，制定台灣統治政策和法律制度，而確立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施行殖民統治、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後藤新平所採行「文裝的武備」策略，落實 1924 年孫文在神戶所主倡「大亞洲主義」的精髓——王道文化的精神，或許這原本就是一條以雙贏為目標的策略統治路線。

在後藤新平的操盤下，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試圖以「公醫」取代西洋的「宣教士」，而以達到以醫療感化台灣社會的目的。然後日本在致力「文明開化」過程中，透過國家衛生體制的建構，台灣民眾開始產生「國家」與「衛生」的概念，對文明的「清潔」空間有新的體驗與認知。作為國家理性具體呈現的「醫學生」，則扮演改造社會的角色，也代表著台灣極少數菁英份子，他們的言動、思想對台灣社會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但不同於日本人師長「與外力競爭」的目標，台灣人醫療菁英則致力於台灣人社群的「民族解放」。

在透過新式教育與近代化思潮洗禮後，台灣人醫療菁英以王受祿為首，更將當時反殖民體制運動的基本訴求「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提昇層次為「台灣是世界的台灣」。換言之從本土意識出發，更將視野拓展至世界，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已經將「台灣意識」與「國際觀」相互接軌。

七、結語——朝往後藤新平的《日本膨脹論》轉型

在「結語——朝往後藤新平的《日本膨脹論》轉型」部分可知，林呈蓉教授對台灣在日本殖民政權統治下的近代化歷史發展概況，特別是後藤新平如何奠定台灣工業發展的基礎，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台灣是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日本於二十世紀初傾力建設台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台灣

豐富的人力物資成爲日本母國建設的金雞母，但台灣人民也因而受惠，現代化的物質生活與知識教育使台灣社會逐漸與西方科技文明接軌。

日本從自由民權運動敗北後，國家掌握主導權，於 1880 年代中期以後，樹立各種制度，大日本帝國的基本架構可說是已經建立起來。而知識人則從經世家扮演民間批評者的角色，政治與思想的距離擴大，因此日本近代史中一直存在著官方之現實主義與民間之理想主義的乖離。

近代台灣歷史的發展進程，與近代日本的國內內外政經情勢以及社會價值觀息息相關，關係甚密，既使到今日，當台灣社會開始考慮重新思考國家的自我定位時，和明治時代日本對於近代國民國家的摸索路徑有形無形中有些許相似。面對著強勁的「國際化」來勢洶洶，「民族主義」是否與「世界主義」能夠共存並榮？「本土化」或是「民族精神」是否需要刻意強調呢？其實這應該是不需要刻意強調，自然而然形成的。

後藤新平承襲德國人的論調，認爲象徵「民族精神」的國粹不是附著在血緣或是土地上，而是附著在文化精神的層面上。雖然在朝往國民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透過日本的引領，台灣社會在有意無意中也走上與日本類似的軌跡，但不容置疑地，台灣社會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與日本社會的終極目標，卻因所處的立場不同而大相逕庭。本書透過對日、台社會在國民國家摸索過程中的回顧研究，試圖爲今後台灣的國家前途尋求一個新的出口。

參、結語

戰後，日本與東亞均有「脫殖民地化」的此一共通課題，然而在面對此問題的同時也要迎向 21 世紀。就日本而言，戰後如何在扶桑四島上形成「日本」的問題，而從東亞的觀點，則是戰後在國家建設中，如何重塑「日本」的問題。這是從東亞的日本研究的理想狀態所分析出來的面向。反過來說，對台灣的日本研究的理想狀態能加以重新考量，也在摸索今後應

形成怎樣的關係。

台灣的史學研究一方面承襲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傳統，一方面繼承第一代來台大陸學者的學風，同時也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可謂多方交會、系出多元。台灣主體性的本土意識，在於肯定台灣本體的存在事實，因此台灣史越來越受到重視，研究領域日益擴大延伸，又能與其他史學典範開啓對話，而日治時代台灣史漸漸成爲重要的研究課題，如殖民近代化的討論或台日關係的探索等皆是。

台灣的日本研究已存在多種形式的討論，但近來對日本論述的必要性又重新被強調，這可說是以台灣社會的變化爲其背景，而此變化又與上述「脫殖民地」的論點有間接的結合。在此意義下，必須進行的是描繪台灣的日本研究狀況，將「台灣的日本研究」置於「世界的日本研究」的觀點出發，希望發掘台灣的日本研究的特徵、特色。如上所述，台灣既擁有與東亞相同的日本研究的諸特徵，同時也在日本統治及中華民國統治的面向上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雖則環境決定論並不是萬能的，但在考量全世界的日本研究時，台灣的日本研究擁有許多應該加以考察的面向。林呈蓉教授對台灣的日本研究，特別是日本殖民政權統治下的台灣近代化發展的研究貢獻卓著。

就此而言，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進行國家近代化、文明化的改造工程，作爲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同樣被挾帶邁向近代化，只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後，台灣和日本的歷史各自分途發展，但五十年因殖民體制而形成「同一國家」的歷史遺續是值得去探討及追索的。因此，研究這一時期的台灣史不只是台日關係表面的外象，而應該是其深層內部的互動與相互探求。

尤其甚者，日本吸收歐美的近代文明成爲大和文化的養分，依照後藤新平的說法，這不是「同化」而是「進化」。換言之，近代日本所建構出「和魂洋才」式的近代文明，在被引進台灣之後，又與島內既存的原住民文化、開港地的歐美文化、以及漢族的移民文化融合在一起，而「進化」

成所謂的「台灣文化」。就如同大和文化就是「大和魂」或被稱為「日本精神」，受到「和魂洋才」式近代文明啓迪之後的台灣文化則結構出「台灣精神」、「台灣魂」，或許以「日本精神·台灣魂」來形容，更可以清楚展現出其實質內涵。

這本書的內容從德富蘇峰的《大日本膨脹論》下，以近代日本的移殖民問題為基軸，檢視日本走向文明開化的軌跡，日本國內在 1890 年代殖民地論強化過程，此時適正領有台灣，影響日後台灣移民事業的推動，進而衍伸台灣島內移民的政策，並且使得日本國家衛生行政在台灣開拓落實，而如何將這套文明開化的歷史經驗套用在新領地台灣的經營上，甚至成為日後台灣社會價值判斷之一重要思考源流的過程。